

中国农业经济问题

伦道夫·巴克 等著

任。

当然，读者应当认识到，在写作与发表文章的过程中，情况通常要发生变化，而写作时的认识和观点也许不能反映现行状况或政策。

伦道夫·巴克

康奈尔大学

拉德汉·辛哈

哥拉斯哥大学

译 者 的 话

新中国诞生之际，西方人士曾预言中国将无法解决吃饭和就业两大难题，不管这种预言是出于什么动机，但今天的事实宣告了这种预言的破产。

使这种预言破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新中国农业的发展。新中国农业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政策促使农业发生的新变化，已经引起西方的惊叹和瞩目。在西方出版物中，过去那种危言耸听的预言渐渐少下去了，比较友好和客观的评论逐渐多起来了。在事实面前，一些西方学者开始用比较严肃的态度研究中国农业问题。尽管西方学者是从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考察问题的，而且他们所遵循的西方经济理论也难免脱离中国实际，但某些学术观点和看法，对于我们扩大视野、启发思考却不无参考借鉴意义。

选译《中国农业经济》这本书，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是因为该书还具有以下长处：第一，该书作者是美国、英国、加拿大一些较长期从事研究中国和中国农业问题的“汉学家”，其学术观点在西方有一定代表性并具有一定影响；第二，该书是按专题编辑而成的论文集，共收入十三篇论文，每篇都由专人撰写，其结构既考虑了新中国农业三十多年的历史跨度，又突出了一些西方比较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比单个作者撰写的专著能更清楚地反映出西方研究中国农业问题的学术成果。这对检阅和浏览西方研究中国农业的情况，

颇有工具书的便利之处。

从该书的主要线索来看，大体探讨了三大问题：一，形成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二，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制度与技术变革的评价；三，最近中国农村经济政策变化的经济原因。作者肯定了中国传统农业的技术成就，肯定了新中国农业在支持国家工业化、解决农村就业、依靠传统技术加上劳动集约促使农业增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同时，对中国农业在政策失误阶段的教训也有一定分析。对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政策的变化，虽然还抱有疑惑态度，但颇有见解地指出：“更基础性的经济因素将继续要求政策发生变化。”当然，也有一些看法是有问题的。例如他们认为旧中国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低下，是农业技术停滞的原因，而不在于土地租佃制；对今后我国农业能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也是悲观消极的。诸如此类反映资产阶级情绪的东西，都有待于读者在阅读中加以分析批判。

译本中所有的地图，均系原文插图，先此申明，文中不另加注说明。

由于受译者水平的限制，本书翻译中定有不少缺点错误，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北京大学经济系厉以宁教授对本书的翻译工作曾给予热情支持，并在百忙中亲自校阅了部分章节，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译者

1984年8月于北京

序 言

本书根据1979年5月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和乡村发展”专题讨论会的发言和论文编辑而成。一些社会科学家和农业科学家聚集在康奈尔大学，讨论近来中国农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参加讨论的与会者近来写过关于中国的文章，但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显然却很少有综合性的著作，而且有关农业经济的著作绝大多数成书于六十年代，因此未能涉及最近实际情况的发展。既然编辑这样一个集子是明显必要的，那我们向一些有见识的汉学家征集一批稿件，就不是太难于做到的事情。

本书头四章介绍背景。它包括作者对近来人们所争论问题的总的看法、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观察、以及对自然环境和自然力资源的描绘。其余八个章节，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重大事情和各种政策，探讨的问题是广泛的。虽然本书重点是放在毛逝世以前的时期，但对近来的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也给予注意。

本书对象是一般读者和关心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学生。每章末尾附有补充读物目录（第一章除外）。附录A中提供了全国的人口、农业生产及农业主要投资的统计数字。

本书受到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系和国际农业计划署的资助。本书的基础研究曾得到亨利·路斯基金会的支持，近来在促进对中国的研究中，这个基金会值得人们给予充分信

目 录

序 言

- 1 中国农业：一些主要的争论……伦道夫·巴克
拉德汉·辛哈 (1)
- 2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农业技术……马克·埃尔温 (15)
- 3 中国现代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的发展……
雷蒙 H. 迈尔斯 (42)
- 4 自然资源和自然力因素……罗兹·墨菲 (55)
- 5 共产主义发展战略中的农业…罗伯特 F. 德恩伯格 (72)
- 6 中国的乡村制度……本尼迪克特·斯坦费斯 (88)
- 7 技术变化……托马斯 B. 威恩斯 (110)
- 8 农业的就业与技术……托马斯 G. 罗斯基 (136)
- 9 中国的乡村工业化……克里斯廷·培瓦·王 (156)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食物消费…尼古拉斯 R. 拉迪 (169)
- 11 粮食生产增长的前景……伦道夫·巴克
丹尼尔 G. 西斯勒 (187)
贝思·露斯
- 12 对外贸易和中国的农业…弗雷德里克 M. 萨尔斯 (208)
- 跋……伦道夫·巴克
拉德汉·辛哈 (227)
- 附录A 农业统计的应用：一些全国性合计数
的例子及其加工的现状……布鲁斯·斯通 (234)

附录B 附加的资料来源..... 伦道夫·巴克

拉德汉·辛哈 (282)

贝思·露斯

本书作者简介..... (284)

中国农业：一些主要的争论

伦道夫·巴克

拉德汉·辛哈

中国农业经济正在经历着一些变化。最近的政策变化，旨在促进农业生产和提高生产率，显然表明中国更热烈地赞成“农业第一”的方针，这使中国领导人和许多外国观察家树立了信心。然而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并有助于人民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仍是争论的主题。

用以衡量中国农业执行情况精确统计依然阙如。然而编辑一组文章介绍中国农业经济的各个侧面，包括其历史过程，1949年后的重大事件与政策，所获得的成就，以及未来的前景，似乎是适时的。本书主要描写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年代，尤其关注毛逝世以后已出现的那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未来的预兆。本章作为卷首，我们对中国农业经济提供一个一般的考察，把下列各章深入探讨的许多有争议问题突出出来。虽然各章不形成一致的看法以及对事情作相同的解释，但我们力图在不修正各种不同见解或裁决各种结论的前提下指出各章中某些相同的观点。

另一方面，人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学并非是“无色彩涵义”的。任何难于符合西方观念的发展模式，通常是受到怀疑的。近来中国的政策变化，似乎使中国的发展模式更接近

于西方关于恰当的发展战略的构想。这有助于使中国人与西方学者一道去抛弃过去一个时期政策指导的错误，并纠正对经济力量的忽视。我们认为，近来中国在农业政策中的变化固然是重要的，但不反映对过去的根本背弃，而宁可说是中国农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渐进和演变。

背 景

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前，中国农业在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过剩等条件限制下，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在此期间形成的技术进步（见第二章），也许容纳了与该时期人口增长相适应的农业生产的长期增长。尽管气候变化莫测，例如经常发生水旱灾害，从而造成歉收，但所有的记载都表明，在单位面积土地上，中国农业获取的收成是很高的。虽然比较高产，但以人均产量比率衡量的农业生产率并无显著增加。而且几乎看不到农业投入的其他方面的资料。

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大多数地区为取得农业进一步增长，已在使用传统投入物——土地、水、劳动等方面竭尽了全力。在中国南部和东部的肥沃土地上，复种指数已超过150。正如埃尔温所描绘的那样（见第二章），这些地区的农业是通过精耕细作达到高产的。除了中国东北，其他地区由于地理与气候条件的制约，开垦新的耕地的潜力受到极大限制（见第四章）。农业生产大幅度的持续增长，大概只能通过使用现代投入物，即由非农业部门提供的化学肥料和农药来取得。从上个世纪开始，日本已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现代的农业制度。建立这种制度的基础是：（1）一个有效的农业

研体系；（2）一个能够生产诸如化肥等投入物的工业部门；（3）能够把这些投入物提供给农民的运输和通讯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把现代农业制度扩及其殖民地朝鲜和中国的台湾。1950年以前，中国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都不可能为中国农业现代化提供类似的机会。本世纪头三十年，即在战争和革命之前，中国农业仍旧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的，只能在维持生存或接近维持生存的水平上负担不断增长的人口。超出生存必需的剩余产品都被土地贵族和国家机器占有了，而只留下少部分剩余产品可用于直接发展的目的。

1949年当新的共产主义政府建立之际，与南亚和东亚各个国家相比，中国在农业发展方面处在一个独特的处境之中。中国不仅面临着长期以来的人口压力，与日本、朝鲜一样在人均占有土地方面处在非常不利的境地，而且缺乏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工业、教育、交通等基础结构。民国时期（1912—1949），曾试图建立一个农业研究体系，但连续不断的战争严重地妨碍了这项工作。除了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满洲，大部分工业是消费品工业部门，生产化肥或拖拉机等产品的设备是极其简陋和陈旧的。交通通讯网尚未形成并极端缺乏。在辽阔而崎岖的国土上开发道路、铁路、航道，是中国面临的首要压力。

象它的南部邻居一样，中国缺乏农业现代化的许多先决条件。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尚有某些未开发的土地可供补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年代里，它们可以依靠对传统投入物的进一步开发来获取农业的大幅度增长。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由于以传统投入物作为物质基础的

农业已基本走到它的尽头，加上人口的高速度增长，农业迫切需要实现现代化，才能避免人均产品和生活水平的恶化。中国仍然缺乏仿效东亚模式所必须具备的工业基础和交通网，而且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甚至不可能暂时地依赖现代投入物资的进口。另一种可能性是引进农业技术，但通常绝大多数引进的技术都需要进行相应的研究，而中国缺乏一个有效的研究体系。正如德恩伯格在第五章和罗斯基在第八章所说，当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后，他们最初试图采取以传统技术的使用与重大社会变革，包括对农民劳动力的调动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农业问题。

农 业 集 体 化

在农业集体化中达到高潮的一系列重大的制度变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乡村基本经济结构具有了新的形式。正如斯坦维斯在第六章所指出，制度方面的这些变化，旨在实现均等、增长和工业化的目标。围绕达到这些目标所要建立何种最恰当的社会制度结构，目前正进行着一场持续的政治争论。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变化的必然结果。这场争论涉及两个相关的问题，即给以农业超过工业的优先考虑的程度和在生产决策中给予农民自由的程度。

从1950年到1952年，进行了土地改革，摧毁了乡村显贵的权力，同时把一些土地分配给每个乡村家庭。但是资本和农业投入的不足，仍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从1954年到1958年，中国农业实现了集体化，并在各个阶段中形成了目前人们所熟悉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结构。对传统社会制度的根本背离，一开始就导致了生产者积极性的丧失。在

1958

1958—1961年的“大跃进”期间，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便是这些变化的结果，虽然气候也是起作用的一个因素。遭受天灾之后对公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收益分配的职责，逐渐从公社一级下放到生产队一级。“文化大革命”中曾试图使核算单位恢复到大队一级，但从1976年以后便呈现了相反的趋势。

德恩伯格在第五章评论了关于乡村制度发展与农业集体化战略所发生的争论。他认为，虽然中国左翼领导人的意图是良好的，但集体化使农业遭到工业发展的“剥夺”。由于强调自力更生，国家只用有限的直接投资来开发乡村资源。强调粮食生产，并通过税收和采取不利于生产者的价格进行定额收购来取得剩余产品。但是应当注意到，在大多数共产主义或非共产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偏向城市和工业，是其政策的特征。无疑，通过集体化易于从乡村取得剩余产品。从这种方式中所获得绝大多数资金，被直接用于非农业部门中关键的发展项目。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集体化是否必要，早先的土地改革是否足以保证公平和效率的实现？迈尔斯在第三章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东亚条件下，从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中可以看到少量的规模经济。然而，德恩伯格（第五章）、罗斯基（第八章）、斯坦维斯（第六章）认为，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生产和土地公平问题本身，集体化过程的重要目的是吸收劳动力、积累资金，以及为工业发展榨取农业剩余产品。

在不可能从城市工业中心取得现代投入物的情况下，依靠公社制度调动剩余劳动力，作为农业的资本投入（例如发展灌溉、改良土壤、生产有机肥）以及用于发展乡村小规模

工业（例如化肥、水泥、机器），从而聊以向乡村提供所需的投入物（克里斯廷·培瓦·王，第九章）。据罗斯基（第八章）考察，在1957—1975年间，中国的农业部门成功地吸收了近一亿新劳动者，使农业劳动力增长了40%。尽管如此，每个劳动者每年的劳动投入至少还提高了40%。

并非所有的耕地都是集体耕种的。大约有5%左右的耕地留给家庭自己经营，除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试图收回这种优惠之外。自营部分大多专门生产价值高的蔬菜和肉类等产品。它的产出，估计占农业收入的20%，这个百分比要比它占土地的百分比高得多。

1949年之后不久，用很高代价调动劳动力来提高复种、收集有机肥、改良水利设施。三十年后，作为公社农业的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率已明显低于公共与私人副业活动的劳动收益。这个事实以及蔬菜、水果、畜产品供给的不足，是目前人们致力于创造一个使个人和小组在决策中具有更大积极性的比较灵活的乡村公社制度的根本原因。

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

以西方标准来看，几乎不能把中国农业看作是现代的，但1949年后三十年是一个迅速发展现代化的时期。我们从回顾这个时期中国农业的执行情况开始，然后考察现代化进行的过程。

衡量中国农业的成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从“大跃进”末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几乎没有公布过有关生产方面的统计资料。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资料了，但仅是在最近才有可能对地区性的不同情况作出

评价。

从1957年到1979年中国粮食生产的年增长率为2.4%，但农业总产值增长稍快一些。这些增长率与印度、南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达到的增长率非常相近。但是这在中国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成就，就如值得重视印度的成就一样。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北部和中部的产量要比南部和西部增长得更快，非水稻产区要比水稻产区增长得更快，具备较好的土壤与水利条件地区的产量要比边缘农业地区增长得更快。当然，正如巴克、西斯勒和露斯所讨论的那样（见第11章），无论在各个地区还是在每个地区内部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东北（从前的满洲）的粮食产量增长最快，那里的耕地扩大了，杂交玉米品种代替了低产的谷子、高粱和大豆，而在北部（中国华北平原）主要表现为井灌的发展和小麦改良品种的传播。中国北方的收成和增长率可以与印度北方相比。相形之下，以水稻为主要粮食的南方，1957—1979年之间的增长低于2%，尽管广泛采用了现代技术，如速效化肥、水稻矮秆品种等。

农业生产的增长，不仅是采用现代投入物资的结果，而且如上所述，还由于显著增加了人类劳动的投入。罗斯基指出（第八章），虽然每人日的产值有所下降，但每人年的总产值并未下降。而以农业总产值与总投入之比率衡量的总生产率，可能是下降的。威恩斯指出（第七章），虽然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缓慢的，但毕竟取得了实际的技术进步。显然，任何使剩余劳动力完全就业并取得年增长率为2—3%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都不可能期望总的要素生产率取得显著增长。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也许可以指望用乡村经济中严重的不充分就业和失业为牺牲代价，来取得生产率的较快增长。

现代投入物资具有许多形式。抽水机取代了手摇灌溉设施从而增进了排灌效率，脱粒机在收获季节节约了劳力，有机肥料与化学肥料的混合使用提高了收成。这些以及其他的物资，都是靠小规模乡村工业生产的。正如克里斯廷·培瓦·王所阐述的那样（第九章），乡村工业与效率的要求是相背离的，但它在农业和乡村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还没有能力建设现代工厂来生产化肥、农药、铁、钢、农业机器、电，并把最终产品交换给农民的情况下，中国采用的技术，其效率虽然低于西方水平，但似乎适合于它的条件。

发展和传播农业生物技术，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对农业技术与推广的投资。这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中都是如此。判断中国的技术与推广体系的能力是困难的。正如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专业研究人员，尤其缺乏具有高级水平的研究人员。但是低层次的、实用的研究推广体系，似乎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谓“四级”（国家、公社、大队、生产队）研究网有可能在本地迅速推广新技术。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压力和命令主义强迫采用不适用技术。

尽管对科学研究的损害不时发生，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甚，但中国仍然成功地发展并传播了水稻、小麦、玉米等现代品种，这些品种的增产潜力不逊于各类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国际水稻研究所和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研究和推广的良种。1977年中国宣称取得了一项值得重视的科研成果，培育出了第一批F₁杂交水稻品种。威恩斯详细记录（第七章）了中国农业研究中的成功与问题。由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成农业新技术的能力，由此

产生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对农业技术研究的长远影响是什么，克服这些影响又需要多长时间？

收 入 和 消 费

试图估量中国经济中的收入与消费的实际情况，甚至要比估量生产成就更为困难。产量数字能向我们表示可得到多少食物的某些指标，但并没有告诉我们各地区或在城乡之间如何分配食物。这似乎使人们对中国达到何种公平程度产生了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已经解决了它的食物问题，但这不是通过令人惊叹的生产增长来实现，而是通过对食物的更公平的分配。这种看法似乎一般地适用于毛逝世以前的时期。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相当部分的人口只得到生存标准以下的食物，即“在贫困线以下”。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来许多西方学者对情况的重新估价已与中国政府政策调子的变换相对应。现领导人的调子明显是否定的，并强调消费结构的不平等以及过去的政策的失败。

所有报道都说1957—1978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只稍稍快于乡村人口增长。据国家统计局估计，1980年乡村人均收入为170元（85美元），城市人均收入要高得多。大多数材料证明城乡收入有1~3倍的差别，而在某些地区可能更高。由于农业产量增长的不平衡、获取自然力因素和接近城市市场的机会不均等，以致在不同公社和同一公社中，甚至在同一生产队中，收入都有差别。但是大多数家庭之间的差别，绝大部分来自于劳动力的差异（每个家庭中健康成年人的数量），而不是来自于对资源的不平等占有或副业收入。

一旦出现收入不平等的情况，那么就可能表明某些地区

的消费水平没有明显提高。1977年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同一文献的修订版中被删除)：“乡村有1亿以上的人口缺乏粮食”，许多学者分析了这种说法。人们似乎认为，从总的热量消费来看，1978年与1957年并无太多差别。这种看法本身并没有解释上引官方承认的饥饿程度。拉迪认为(第十章)，地区间分配不平等的恶化状况，是由于地区间不等速的农业增长引起的，并且是由于中央政府无力或不情愿减轻分配的不平衡，即无力或不愿意从余粮区向歉收区运输食物造成的。勿庸置疑，拉迪的分析仍然不能解释中国官方关于有一部分中国人不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粮食需求的说法。许多观察家相信，中国对粮食的分配，要比印度和其他南亚、东南亚国家公平。

压低消费的主要原因是整个积累与投资的很高比率。积累被用于发展乡村小规模工业以及诸如保健、教育等服务事业。由于许多城市建设是通过调动劳动力来实现，因此在劳动力剩余经济中是不容易弄清这种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的，从而总投资的确切数量就仍旧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中国的乡村投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一些。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央政府对农业的投资是不足的，因此缺乏大量的工业投入物资。

影响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人口增长。这里同样缺乏可靠的数据以至难于展开分析。但人口增长率已明显从过去2%以上逐渐下降到1—2%之间。现领导人认为这还太高，并在1978年就提出，到1980年要下降到1%。采取了高额奖励与严厉制裁措施让人们接受一个或两个孩子的家庭观念，甚至在乡村地区，这个计划也得到令人瞩目的成功，而乡村的传统习惯一直是强烈地鼓励保持大家庭。